

感悟式批评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启示

丁光英^a, 吴晓川^b

(西华师范大学 a.文学院; b.图书馆,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感悟式批评强调灵感、想象、即兴、直觉,这与以自由、浪漫、超越、灵性的巴蜀文化传统在精神上不谋而合。新时期以来,出版业的振兴、文学创作高潮迭起,与之对应的是文学批评的热度持续,但此时的文学批评开始大规模引进建立在西方哲学、社会思潮理论背景上的批评模式,而更具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却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忽视,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显然也受此影响。那么在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感悟式批评融合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感悟式批评中获取灵感,阐释其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创作的启示。

关键词:感悟式批评;巴蜀文学批评;启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2-0091-05

Enlightenment of Perceptive Criticism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ongqing and Sichuan

DING Guangying^a, WU Xiaochuan^b

(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 Library,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China)

Abstract: Perceptive criticism emphasizes inspiration, imagination, improvisation and intuition, which coincides in spirit with the tradition of Chongqing and Sichuan culture of freedom, romance, transcendence and wisdom. In the new times, the booming publishing industry contributes to the prosperity of literary creations, and correspondingly, the heat of literary criticism. However,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tarts from large-scale introduction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odes based on theori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oughts, and the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perceptive criticism is gradually neglected by literary cr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ongqing and Sichuan is also affected. Then, in contemporary Chongqing and Sichuan literary criticisms, how should we integrate perceptive criticism into our practices? This paper draws inspirations from perceptive criticism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o interpret its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ongqing and Sichuan.

Keywords: perceptive criticism;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ongqing and Sichuan; enlightenment

从先秦、两汉的《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到唐、宋的诗、词,再到明、清的小说、戏曲,无不是前人对个人情感和生命经验的阐发。因而,古代文人谈论甚至是批评一篇作品时,往往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所谓的感悟式批评就是评论主体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以直观感受为基点并结合一定的审美能力对文学作品进行论述的批评写作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批评范式的感悟式批评,自出现起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77};到刘勰《文心雕龙》里的“神思说”;再到钟嵘《诗品》中的“气之动物,物

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无一不在强调诗是情感的流露。细读文本,品味情感,是掌握感悟式批评的基本方法。因而感悟式批评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灵性的言述方式。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对中国的大量侵入,往哲先贤们逐渐意识到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重要性。从梁启超、魏源等人以冲破封建政治制度壁垒为目的的文艺批评开始。中国注重温柔敦厚、融洽自由的古典文学批评范式慢慢地演变成了强调抗衡与齟齬的批评方式,这样的情况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五四时期,越来越多

的西方文艺理论传入中国,表现出批评内容与批评方式的多样化。此时的文学批评还处在古典传统文论与西方理论兼容并包的状态,两相对比,外来的文学批评范式在这个时期逐渐占据上风,而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遗产的继承却是慢慢退居弱势地位。而无论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方式,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传入,都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批评者大都对西方的文学批评范式有一种极度崇拜的心理。而忽视中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一味地迎合国际,亦步亦趋地跟随国际潮流,导致某些文学批评者喊出了“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的口号,这导致文学注重个体生命经验表达的中国传统感悟式批评逐渐边缘化。西方的文艺批评范式重视理性与逻辑思维,但由于缺少情感的体验,简单地运用逻辑推理等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则会破坏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营造的意境,难以直接展现文本中的情感。中西方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二者的文学批评方式也大相径庭。无论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核心要素是要立足于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遗产。自近代以来,感悟式批评虽然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但近年来,信息与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热衷于即时性的文学,时代的变革让感悟式批评似乎有了再一次中兴的机遇。而四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脉,在新的时代里,无论是文学还是文艺批评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从二者当前的境遇看,感悟式批评或许可以为四川文学如何焕发新的生机提供思路与方法。

一、巴蜀文化及其孕育的巴蜀文学

感悟式批评重情感,轻逻辑与理性,强调即兴感发,表现的是对文本最初的印象。往往会充满自由的联想、生动的语言和醇厚的人情味。相较那些理论优先的评论方式,感悟式批评则显得文采斐然、灵动飞翔、个性张扬。从本质上看,这和自由浪漫的巴蜀文学不谋而合。处于内陆崇山峻岭包围的巴蜀地区,在自然风貌和社会品格上都有其特殊性,其文学是中华文库中不可忽视的一脉。巴蜀地区独特的环境造就了自在洒脱、不受羁绊的巴蜀文学。

(一) 灵动、飘逸的内在精神

巴蜀文化孕育于物产丰富、山清水秀的四川盆地。闻名遐迩的“天府之国”养育了巴蜀人,是巴蜀文化的摇篮。蜀地的易守难攻使其受战火的牵连少。在安史之乱后蜀地成为唐朝皇帝逃跑的避难

所,杜甫也为了躲避战乱弃官入川。四川处于内陆腹地,有防止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一旦有外敌攻破四川,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因为地形的繁复,气候适宜,盆地物产丰足,使老百姓有相对舒适的生活。马克思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生活的安逸使得川内人民在相对闭塞条件下也能形成慵懒、闲适、自由的“蜀地性格”。这里有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茶馆文化”“酒文化”“戏曲文化”等,林林总总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学”。“诗仙”李白,嗜酒成性,据传他往往在酒入愁肠、痛快淋漓之际方能挥毫泼墨,狂傲中带着洒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清新中似有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蔑视世俗的不羁,“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身前有限杯”……到了近代,川人又将“蜀地性格”融合进现代白话诗和小说,除了郭沫若、康白情的白话新诗,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李颀人的《暴风雨前》《死水微澜》及《大波》了。他的《好人家》为我们窥探了普通川人赵幺粮户一家的日常生活:起床——弄早饭、吃早饭——呆坐、打呵欠、抽鸦片——吃午饭——述旧——吃晚饭——早早入睡,将川人安贫乐道的日常生活折射于文学作品中。沙汀后来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又将“川话”的语言风格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潇洒犀利中带着流畅清透。

(二) 热切、反叛的外化表现

虽说巴蜀文学孕育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但其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却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从当代巴蜀杂糅并包的“火锅精神”,就可见巴蜀文化的个性特质。火锅作为巴蜀人民最寻常的饮食,即便是尝尽人生百味的味蕾,在见识过火锅的滋味后,也会即刻体会到巴蜀人民的热辣。“有菜当三分粮,辣椒当衣裳”,可见火锅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蜀地独特的饮食习惯形成了“无火锅不巴蜀”的饮食文化。川内百姓也像火锅一样,有兼容并蓄的神韵。这种独特的精神品质,向世人展现了巴蜀人民包容开放的心态。另外,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强调“静吃”,火锅显然与传统背道而驰。与讲究众多规矩的其他饮食文化相比,火锅显然打破传统饮食习惯,自然也就成了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从古至今,巴蜀民众在文化领域具有强烈的先驱精神。马蚕娘娘、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才女薛涛、花蕊夫人等。这些凄美的故事,因对正统观念的颠覆而显得难能可贵。司马相如将汉赋杂糅各家,独创别具特色的散体大赋,成为后来诗赋模仿的典

范;扬雄更是四川文化史上走向全国的第一人,在文学、经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甘泉赋》《羽猎赋》等加入了劝讽的成分,给予了汉赋新生命;唐代的李白,歌行体在其手中发扬光大,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成就;宋代的三苏,特别是苏轼,小家碧玉的词在他的手中变得磅礴大气,焕发出新的光彩。后来的杨慎一直到近代新文化的先驱,蜀中才子一直都孜孜不倦地追求文学上的变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巴蜀文学就已经彰显了自己思想启蒙的讯息,1913年的《文艺周报》、1914年的《娱闲录》都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因地理位置的影响,四川文学不能第一时间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先锋杂志的传入,到1919年7月李劫人创办的《星期日》周刊(这是四川新文学兴起的标志之一),再到吴虞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要害》《吃人的礼教》,让巴蜀文学加入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并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郭沫若、康白情的白话新诗,前者的《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用打破常规的方式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对黑暗的无所畏惧、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希冀。康白情是新诗的主要倡导者,其诗代表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奔走呐喊,是时代的缩影。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新青年对封建家长制的强烈控诉;李颀人的“大河三部曲”,将宏大的历史背景折射在西南边陲的一隅小天地里,以小见大;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对统治者之间的钩心斗角进行了强烈的讽刺,表现了人民对民主的渴望;艾芜的《南行记》,真实地记录了滇缅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思路。另外在文学批评方面,有郭沫若的《诗论三札》《论节奏》《生命的文学》,康白情的《新诗之我见》,李颀人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等,这些文章对当时的四川文学乃至全国文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二、巴蜀文学的当代创作与批评

在新时期里,巴蜀文学的创作流露出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特点。从其本质上来看,依然承袭了巴蜀文化逍遥无拘的特点。无论是从题材、内容还是思想表达上都有着不拘一格的特质,这样的文本建构是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而在新时期里,随着中外关系的破冰,众多的巴蜀批评家敞开胸怀去迎接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他们占有,却不挑选。未

曾斟酌中西方文学间的齟齬,勉强将西方的文学批评范式加诸本土文学,是一种随大流,不从实际出发的表现。这样的文学研究,疏漏了巴蜀文学的本质,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遗产的继承也是一种遗憾。

(一)继承传统的新时期创作

在诗歌创作上,流沙河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诗人的代表者,是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既有古典文学里遣词造句的优雅,又带有地方特色的幽默粗拙,这与他长期生活在四川有很大关系。尽管流沙河的诗歌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像《读地球仪》一诗就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将抒情主人公幻想成外星人,如梦非梦,朦朦胧胧。在写实之外,其诗歌语言幽默风趣。他曾经有过一段长期和“川汉子”们朝夕相处的经历,这些朴实粗放的男子汉在劳作的过程中嬉皮笑脸、戏谑调笑的话语给流沙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来源于身边小事的诙谐气质影响了其诗歌语言口语化的表达。流沙河曾经说过:“我说不来普通话,我的诗大都用口语写成甚至在改别人的诗时,也改得趋向于口语。老习惯了,改不掉了。”^[31]这种以“川味”口语凝练而成的文字,亲切逼人,令人身临其境,仿佛是看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故园九咏·哄小儿》^{[4][34]}:

爸爸驮你打游击,
你说好要不好要?
小小屋中有自由,
门一关,就是家天下。

这样的话语形式与诗人的个人气质完美融合,为读者展示了巴蜀方言独特的艺术魅力,并使流沙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诗坛上独树一帜。

周克芹与阿来是新时期巴蜀小说的杰出代表。周克芹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由于他个人的生活遭遇,他对四川农村的描写极其精到。周克芹曾说他的创作是生活中逐渐累积起来的情感的外泄,随心而作,所以在那一场十年浩劫中从未唯政治方针马首是瞻,而是与人民百姓站在同一立场上,写出了《李秀满》《希望》等作品。而发表于1979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更以拨乱反正的姿态指出了极“左”路线在十年浩劫中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彼时“四人帮”刚刚被摧毁,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还未完全打破政治权力话语的束缚。这部小说以先行者的笔触揭示了历史波折期的农村状况。在他的小说里,有形形色色的川农形象,尤其是他笔下女性形象,通过她们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驯良,还可以一瞥传统道德对人性带来的

消极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克芹的作品中,家庭伦理下的亲情被异化了,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对父幼情深的想象。用这样突破旧规的方式表现了时代变革对人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向我们展示了巴蜀地区百姓在历史转折期的生活状态。而阿来,以其对藏人生活的独特描写而在当代小说史上大放异彩。其小说也自有一种闲适淡然在里面。李敬泽曾说阿来的小说语言蕴藏着一种“透明”的气质,以清新、纯真的状态去逼近事物的本相^{[5]68}。这或许与他颠覆性地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智力障碍者形象,用“傻气”来和现实生活中的污浊和喧扰相对抗,通过他们可以窥探作者对人性最单纯执着的坚守。阿来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史诗性,作为一个生活在四川境内的藏族人,其思想受到了汉文化和藏族文化的浸染。他用汉语写作,却用古老的藏族神话来虚构小说的主体内容,超越现实的想象却可以反映出生活最真的本质。即便是阿来这样天马行空的藏族作家依然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有着深厚的巴蜀情怀。阿来长期生活于成都,他不爱这座城市的热闹繁华和享受当下的悠闲生活,却喜这座城市独特的自然风光给他带来的精神慰藉。他将成都的历史文化融入多种多样的花草中,写出了《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抒发了他对个体生命和人生命运的喟叹。

被誉为“巴山鬼才”的魏明伦创作出的一系列剧作,用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寓悲于喜”的悲剧色彩,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了巴蜀戏剧。其勇敢无畏的反叛精神,继承了巴蜀文化自由、果敢的本质。在他的剧作里,为我们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巴蜀戏剧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这种以巴蜀文化为背景的文本建构,表现了作者强烈的乡土情怀,呈现的是巴蜀人民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魏明伦出身于戏剧之家,从小跟着家人走南闯北,无数凄凉故事萦绕在他的内心。因而在他的文本里融入了强烈的个人主观情感。《易大胆》中的九龄童与花想容之死就取材于民国时期的川剧演员康芷林与李淑卿之死。他曾在《我“错”在独立思考》一文中说:“我的格言是——我不迷信一切格言!”^{[6]40}因而《巴山秀才》用迂腐的孟登科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制度对人的迫害;而《潘金莲》《变脸》更是对封建男权意识的有力鞭挞。在他笔下的一系列匪性十足的川汉子和火辣刚硬的川妹子形象,都烙印着热烈反叛的个性。魏明伦作为新一代川剧作者的佼佼者,其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巴蜀历史文化的沃壤上,陶冶着他深厚的戏曲功力,独特的巴蜀方言

也为他的剧本增色不少。这种诚挚的巴蜀文化认同感是其作品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西方批评方式的兴起

巴蜀文学创作的发展都流淌着巴蜀文化的特质。而与此相悖的是,巴蜀文学批评却是不同于文学创作的发展。在当代,四川文学同整个中国文学一起受到各种外来批评方法的影响。特别是1978年以来,受到西方多种文艺思潮的浸染,20世纪八十年代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到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这些在巴蜀文学的批评领域中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众多批评家跟随大流,并未进行严谨的理解和借鉴,也未曾意识到西方批评范式产生的背景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应用这些批评范式对巴蜀文学进行“强制阐释”,有可能是一种脱离作者创作实践的行为。

像司广贞的《中国现代小说之滥觞——读郭沫若早期的几篇小说》中就应用表现主义、意识流及弗洛伊德的“梦境说”对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进行解剖;汪泽树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巴金的小说》从接受论的角度阐述了巴金小说的美学价值;另外像夏爵蓉的《为灵魂寻找寓所——评邓军吾“五四”时期的新诗》、何性尧的《“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长流”——试论罗淑小说的独特贡献》、雨樵的《思维·情感·形式——试论林文询的美学追求》等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多种文学理论与方法,自有其新颖独到之处,但这些理论性的文章往往缺少烟火气。王晓辉的《论郭沫若历史剧中的民族精神》《在古人的骸骨里吹进“五四”精神——论郭沫若剧作的早期时代感》,前者开篇就写到“只要你一接触到郭沫若的历史剧,就立刻会感受到一股精神力量的震撼,那就是充满其中的忧患意识‘舍生取义’的涅槃精神”^{[7]101}。虽然这样会使得评论的主题开宗明义,但少了一点人情“味”;后者试图通过郭沫若历史剧中的“五四”精神的分析,得出其早期剧作表现时代精神的具体手段,分别是“翻案”法、“借代”法、“感兴”法、“假想”法、“虚构”法,这些文章一味追求理论高度,显得太过刻板而不够生动。

当代的巴蜀文学批评家不仅套用西方批评范式重新阐释巴蜀文学在“五四时期”的创作,也用此方法对新时期巴蜀文学进行评价。阿来作为四川当代小说的代表作家,自出道就引起了学界关注。众多的西方文艺理论也引进了阿来小说的研究领域,如后殖民批评、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生态批评等批评范式,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范式为阿来

小说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参考。但这其中的一些评论家并未真正关注阿来的写作背景,盲目地将西方理论与川藏地区的现实语境相结合,也并未理解阿来的生长环境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如德吉草在《认识阿来》一文中表达了处于汉藏边缘的作家会有一些“失语的尴尬”,缺乏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没有真正依靠藏语语言进行创作。谭光辉也对阿来使用汉语进行创作表示了困惑^{[8]58-62}。这二者都曾忽略了阿来的成长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阿来是生活于川藏地区的藏族人,但自小接受的是汉语语言的教育,对用汉语写作或是翻译的文学作品爱不释手,在阿来创作的旺盛时期都是生活在汉族聚居的地区。他不是第一个用“第二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使用“第二语言”可以更好地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使用“第二语言”进行创作。在对阿来的评价中,生搬硬套西方的批评范式,不能对阿来的写作实践做出客观贴切的研究。在诗歌评论方面,曹纪祖一直执着于新时期的诗歌评论与研究,特别是对新时期的四川诗歌有着全方位的了解,并将他多年来的心血凝结为《批评与思考:中国新时期诗歌》。文中的《新时期的四川诗歌》重新梳理了以流沙河、孙静轩、傅天琳、叶延滨、杨牧、吉狄马加为代表的新时期巴蜀诗歌的现实主义主流,指出表达真情,关注人生始终是四川新时期诗歌的主旋律。但他忽略了巴蜀诗歌的现实主义源头可以追溯到巴蜀古典文学的创作中,这确是一大遗憾。

纵观整个巴蜀文学的创作,其先天就有着不拘一格的精神。诚然,西方批评范式的崛起,为巴蜀文学的批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也导致了新时期巴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对理论高度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立足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另外高度学术化的批评文章也有其呆滞、刻板的一面,难以适应当今即时性文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有效利用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来打破巴蜀文学当前出现的阻滞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感悟式批评的方法与启示

从以上对近代以来巴蜀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分析来看,巴蜀文学本质上依然是容身于古典文学的遗产。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是提供巴蜀文学向前发展的外向思维,文学、文艺理论的前行最终得落实到本土文化。在文学快餐化的时代洪流中,即时性的文学选择显然更受大众的青睐。感悟式批评由于批评者自身的灵活性、随意性,较一些

理论先行的批评方式,更加适应当今文学的迅猛发展。而巴蜀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中相对封闭的一脉支流,如何利用传统的感悟式批评让自己重新焕发活力?除了要发挥巴蜀文化的资源优势,将传统资源融合在批评创作的阵地中,也要将自身的特点与感悟式批评的优势相结合,以展现巴蜀文学独有的时代风貌。

(一)批评需要主体情感的融入

当前巴蜀地区的许多文论,有一大部分是由各式各样的理论术语堆砌而成。批评者好像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不带任何情感。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表现空间,而这个空间往往是作家自己的理想世界,作为评论者要想走入这个世界,就必须与作品产生情感共鸣,这样才能达到作家、作品、世界、读者的完美契合,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通过文本的细读。在这一方面上,感悟式批评能够给予巴蜀文学一些新的思路。如金圣叹将自己的理想抱负、人生喟叹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融入《水浒传》的评点中;李健吾把对杂剧的推崇挥洒在《一个有血肉的色公——杂谈〈包待制陈州糶米〉杂剧》;李长之将自己对鲁迅与嵇康的热爱熔铸在《鲁迅和嵇康》一文中。这些经典的评论文章因为注入了个人情感,而变得鲜活生动,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观赏性和可读性。

(二)灵性的言述方式

批评主体在生活体验的掌控下对文本直观评价,其文章往往会充满自由的联想、生动的语言和醇厚的人情味。相较于那些理论优先的评论方式,感悟式批评则显得文采斐然、灵动飞翔、个性张扬。如以下两个片段:

A:a.凝聚与发展中人物的交叉模式

b.“家”主题的检验:在礼教与经济的撞击中

c.人道主义:“家”曲折运行的减速剂

B:话剧有些戏纵容演员。但这些戏中有的不失为好戏。而另有些更好的戏,却让演员感到一种压力:因为往里钻,戏把他们挡在外头,闭门不纳。生活在这里天衣无缝,现实和真实统一了,不给演员空子钻。这是第一等戏。我们今天有幸在吴祖光的《闯江湖》里读到。生活本身有一道闸,拒绝一切不和它一致的干扰。这里有白描,这里细节俯拾皆是,自然形成一种线条,饱满丰盛,而又美好多姿,而又是戏,和细节一样俯拾皆是。

A是四川本土学者荣隆徽的文章《〈寒夜〉:巴金家庭小说的总纲》^{[7]164-172},B是现代文学史上感悟式

- [11] 范司永. 大学英语翻转教学模式下的师生共建作用探析[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8(3): 66-69.
- [12] 于苗. 基于校园教学平台的大学英语翻转教学实践[J]. 明日风尚, 2016(23): 156.
- [13] 刘洋. “导学启发式”大学英语翻转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J]. 牡丹, 2016(20): 69-70.
- [14] 赵励轩. 手机App在大学英语听力翻转教学资源建设中的应用研究[J]. 英语广场, 2018(7): 52-54.
- [15] 张维宁. 翻转课堂, “翻转”了什么?——对应用型本科大学英语课堂实施翻转教学的思考[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6): 115-117.
- [16] 谭武英. SPOC视阈下应用型大学英语混合式翻转教学范式研究[J]. 课程教育研究, 2017(51): 115-116.
- [17] 王燕, 李庆文, 徐玉红, 张文静. 基于手机APP的大学英语听力翻转教学资源建设研究——以荔枝播客为例[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5): 226-227.
- [18] 刘斌. 大学英语课程翻转教学模式应用分析[J]. 长江丛刊, 2016(30): 68.
- [19] 袁笑文. 微课在大学英语课堂翻转教学中的应用初探[J]. 课程教育研究, 2016(29): 100-101.
- [20] 马亚菲. 翻转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探索[J]. 高教学刊, 2016(4): 114-115.
- [21] 肖芳英, 翟晓丽. 翻转教学模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探索[J]. 海外英语, 2015(14): 79-80.
- [22] 宋军, 程炼. MOOC平台下的大学英语PBL翻转教学模式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5(5): 136-140.
- [23] 高非. 大学英语立体翻转教学模式[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5(7): 78-79.
- [24] 姚兰. 翻转教学模式在艺术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实践初探[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11): 139-140;
- [25] 刘丽华, 李明君. 大学英语语法课堂的“翻转”教学模式[J]. 科技展望, 2014(20): 39+41.
- [26] 大学英语教学将大变革[EB/OL]. [2018-08-26].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12/27/content_5469369.htm.
- [27]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2018-08-26].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03/01/content_19492625_6.htm
- [28] 我院举办《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范式改革专题研讨会[EB/OL]. [2018-08-26]. <https://wgy.zufe.edu.cn/info/1109/5306.htm>
- [29] 毛洪涛, 廖春华, 曾双宝. 着力教学创新 推进课程教学范式深刻转变[J]. 中国高等教育, 2013(2): 35-37.
- [30] 关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课程教学范式综合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及修订教学大纲的说明和解读[EB/OL]. [2018-08-26]. <http://jxfsgg.huel.edu.cn/nr.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2195&wbnewsid=4223>.
- [31] 陈坚林. 外语教学研究发展趋势与外语教学改革[EB/OL]. [2018-08-26]. <http://fls.whu.edu.cn/info/1017/1246.htm>.

(上接第95页)

批评代表之一李健吾的《读‘闯江湖’偶感》^{[9]39-41}。前者试图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来分析《寒夜》中的家庭结构和人物模式;后者用娓娓道来的话语,拉家常似的风格就将《闯江湖》里面的白描手法一一勘破,清新晓畅、明白易懂,这也是传统的感悟式批评发展到今天的特点之一。感悟式批评的魅力也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多元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传统的中国文学,不论是文学体裁上如小说、戏剧、散文,还是在文学传播方式上如报纸、杂志,仿

佛都已经在各种新鲜事物的冲击下失去了部分影响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巴蜀文学如何寻求突破,焕发自己的生命活力,完成时代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文艺理论不过是辅助研究者探寻作家作品的一种工具。只有在对作家及作品的全面理解上,研究者做的研究才是有灵魂的,有血肉的。在文学批评遭遇瓶颈期的当下,来自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或许能带给我们新的思考,这不仅是文学回归传统的一条途径,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遗产继承的一条途径。

参考文献:

- [1] 朱熹. 论语集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 [2] 钟嵘. 诗品集注[M]. 曹旭, 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3] 叶潮. 口语化与幽默感——流沙河诗歌艺术探微[J]. 当代文坛, 1985(11).
- [4] 流沙河. 流沙河诗集[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5] 杨霞. “阿来作品研讨会”综述[J]. 民族文学研究, 2002(3).
- [6] 魏明伦. 我“错”在独立思考[M]//魏明伦短文[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 [7] 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 四川新文学研究[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
- [8] 德吉草. 认识阿来[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6).
- [9] 李健吾. 读《闯江湖》偶感[J]. 人民戏剧, 1979(12).